



“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开篇①



何以中国 何以不朽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王巍

本报记者 王慧峰



这是8月6日拍摄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无人机照片)。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地南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遗址主体为距今约4000年的石砌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区域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玉器、骨器、陶器,遗址的城门遗迹、宫殿区也被逐一揭示。目前,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新华社发

开栏的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源,水之本也。为雨为露,为泉为渊。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发端于何时、何地?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回合?这些问题牵系根脉,事关“何以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远古文明,独立起源的中华文明能延续发展至今的内在脉络是什么?这个文明古国如此强的韧性和生命力是如何造就的?又能为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和智慧?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立项。

该项目由科技部立项,作为国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项目,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20多个学科。20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多学科交叉研究,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工程。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部邑性遗址……一系列层出不穷的重要考古发现,掀起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明确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近年来,关于中华文明溯源的专题讨论持续在全国政协委员中保持着火热温度。无论是“国学——‘大一统’观”读书群中每每持续到凌晨时分的线上交流,还是“文明溯源深度谈”委员约书群中已经进行了十多次的线上集中讨论,抑或是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特质”研讨座谈会,线上线下交相辉映,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研学掀起一个崭新的高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生于斯,长于斯,我们身上所有文明的印记,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我们追根溯源,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就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从中华民族筚路蓝缕、顽强坚韧、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文明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从本期起,《新闻眼》栏目将开启“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系列报道,通过探访解读全国性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梳理描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蜿蜒瑰丽的脉络,以显示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链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过程

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分为预备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阶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2001—2003年)。由于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单位多,研究的内容复杂,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因此首先于2001—2003年进行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预备性研究设置了“历史文献与古史传说研究”“天文考古研究”“史前符号汇集及其与文字关系研究”“关键遗址的测年技术研究”“冶金术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资源与贸易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经济状况研究”“文明形成时期聚落与社会研究”“环境变迁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等9

个课题。经过研究,各个课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预备性研究最大的收获是,初步摸索出一套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为正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这一阶段开展“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这一时段是龙山时代晚期到商朝初年。主要探讨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环境背景和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之所以从中

原地区入手,是因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建立,又有较多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作为参考,比较容易推动相关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主要研究该时段中各个地区都邑和区域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变化、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09—2012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研究的

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记者:上述文明标准也适合其他原生文明吗?

王巍:当然。不同文明虽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显王权的方式和国家形态各不相同。在中国,彰显方式如精美的玉礼器、青铜礼器、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则用黄金、宝石、宏伟的石砌神庙、金字塔和大型墓室来表现。

记者:如您所言,“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来验证”。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依据有哪些?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四个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性遗址: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我们当时就把宝押在良渚了。事实证明,良渚遗址为探源工程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

在良渚,我们发现了修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还发现了防止水患、总长度达几十公里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发现揭示出,良渚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王权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选理由就是它展示了一个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存在明显社会分化和等级信仰体系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形态。这标志着,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此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约5100—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在距今约5500年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交流密切,并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及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

距今约4500年前,通过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等先进文化因素传入我国,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形成了“早期中华文明圈”。

距今约4300—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基础上,其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王朝建立后,它又自己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辐射,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贡献,揭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多学科的研究,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手段和人文科学手段,构建了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更为详细的考古学年代框架,让研究者发现了过去难以发现的角度,拓展了我们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时间范围依然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重点研究课题包括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各地区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各地区技术和生业的发展以及铜、玉、盐等重要资源与文明形成的关系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2013—2018年)。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第三阶段设置的年代、环境、生业、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以及整合研究等重大课题继续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四阶段结项报告。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2020—2024年)。这一阶段仍然延续探源工程前四阶段的方针和技术路线,将近几年新发现的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重要遗址纳入工程中,并加强了理论阐释方面的力度。

(王慧峰)

向前再探3000年

本报记者 王慧峰

“下一步,我们还向前再探3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至今20载,谈及这覆盖自己考古生涯一半的20年,王巍直言“深感幸运”。从2002年起领衔“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巍与众多专家学者追本溯源,寻找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起源,解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追问。

从1921年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进行科学发掘的第一铲开始,中国考古已经走过百年。正是一代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用一铲铲泥土、一滴汗水,解封了中华民族关于祖先的记忆,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繁盛。

王巍透露,下一步将进一步拓展探源工程的时空范围。“在时间维度上,我们还向前再探3000年,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即距今8000年左右,中国农业的初步发展、精神文化和社会变化等面貌。关于夏代的历史问题也将是研究重点。我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而对于夏始初年考古发现——河南王城岗遗址和新砦遗址的整体发掘,都城面貌及其内涵等,尚待继续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将为我们揭示出越来越清晰而真实的‘中国’。”

在空间维度上,他们打算把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地区的遗址都纳入探源工程中,研究这些区域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原因、背景和过程,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

中华文明之流,亘古及今,绵延不绝。漫长的岁月中,在域内各民族间的一次次水乳交融里,中华民族的范畴不断发展与丰富。在与域外文明的一次次辉映互鉴下,世界认识了中国,中国也倾听了世界。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何以中国”,实为中华民族之永恒命题。已经走过5000年的中华文明,为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我们提供着强大的智慧和力量支撑。

在王巍看来,多元融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纵观中华文明早期的演进,可以看出中华大地各区域的文明异彩纷呈。其中,黄河中游地区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文明因素,最终融合到其他区域的文明。历史表明,各区域的文明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正是由于多种文明汇聚融合,才使中华文明充满活力、持续发展。

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中华文明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成果并创新发展。即使在史前时期,交流就已经普遍存在,持续的跨区域、跨族群的交流,记录了文化互鉴的历程,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持久兴旺的关键,是中华文明魅力永恒的支撑。只有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才能使文明之树常青,使中华文明永葆活力。

文化软实力是增强中华文明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保障。夏商周文明不断凝聚先进理念,造就了以“礼”为重要内容的主流价值观,这一内涵丰富的思想影响了周围广大地区,引领、推动了这些区域的文明发展。秦汉以后,“礼”被传承弘扬、赋予新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并通过交流互鉴传播到周围国家和地区,成为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理据。

中华文明延绵至今,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通过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王巍表示,农业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基础。根据考古发现,世界上几大农作物中的粟、黍、稻、大豆都是中国原产。浙江上山遗址出土了大约1万年前的栽培水稻,引发世界关注。同一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最早出现了陶器,这是中华先民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2020年,“探源工程”开始实施第五阶段。王巍希望,探源工程能够在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技术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与文献史学的融合,共同阐释中华文明历史。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不断创新。”在王巍的展望中,在几代学者们共同努力下,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机制,必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